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之四

旧石器时代论集

——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钟侃 高星 主编

文物出版社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之四

旧石器时代论集

——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钟侃 高星 主编

文物出版社

2006·北京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校对 陈 婧
责任编辑 李 莉 冯冬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石器时代论集: 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10-1764-6

I. 旧… II. 宁… III. 旧石器时代文化 - 文化遗址 - 考古 - 灵武市 - 文集
IV. K878.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1336 号

旧石器时代论集

——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钟 侃 高 星 主编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22.75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764-6/K · 932 定价: 170.00 元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文艺复兴”

(代序)

2003年9月19~23日,在金秋送爽、秋雨阵阵之际的塞上明珠银川,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古人类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能有机会参加这次盛会我非常高兴。这的确是个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八十年前,两位西方的学者、地质学家德日进神甫和桑志华神甫历尽艰辛、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中国,在宁夏灵武横城水洞沟的黄土断壁上第一次发现了古人类文化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又找到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动物化石等遗物,从此揭开了中国史前研究的新篇章。在这个遗址材料的基础上,他们在法国和布勒、步日耶共同研究并完成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一书,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篇之作。作为耶稣会的成员,德日进和桑志华为达到现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来到中国,在水洞沟却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联系的线索,同时也为中国的古人类学和第四纪研究打下了基础。应该说,水洞沟之所以值得纪念,还因为它是旧石器时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连接点。关于这个遗址的发现经过及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会议有许多重要的报告讲述和讨论,其成果已体现在这本论文集中。

在此我想粗浅地谈一谈水洞沟遗址进行的几次发掘,特别是最近一次的田野发掘和由此反映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及古环境研究等诸学科的发展历程。

水洞沟遗址先后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有系统的发掘工作。即:(1)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主持的第一次发掘;(2)1960年中国与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的第二次发掘;(3)1963年裴文中先生领导的第三次发掘;(4)1980年宁夏博物馆考古队主持的第四次发掘;(5)2003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对这个遗址进行的第五次发掘。

第一次发掘完全是由法国人主持的,出土标本大部分被运到国外。当时

中国还没有一位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第二次发掘时，苏联专家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中国学者也参加了工作。第三次发掘完全由中国人主持，那时我们早已经有了以裴文中先生为首的一支人数还不算多、但已具有一定水平的队伍。

可喜的是，1980年由宁夏文物系统主持的第四次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物，目前已出版了一本内容丰富翔实的发掘报告，即《水洞沟》一书。这标志着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力量的壮大和各级政府领导对文化、文物科学工作的重视，说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五次水洞沟遗址的发掘，于2003年夏进行，由高星博士主持，是迄今规模最大、最为系统、最为精密的一次考古发掘。发掘采用了严格的国际标准，尽最大可能获取了发掘地层中蕴藏的各种科学资料和埋藏学信息。他们发掘了几处新地点，发掘出多个文化层，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制作和使用过的石制品、骨制品，还发现了制作精美的装饰品。这些都是重大突破，扩大了水洞沟遗址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以前的欠缺，使我们大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水洞沟遗址的科学内涵。这次野外工作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一地区古人类制作工具的技术特点、生存能力和行为模式，这些资料对阐述当时人类的制作技术、生产力与文化水平乃至审美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参加这次发掘的人员是来自国内近10个科研单位、高校的专家和学生，许多是作为志愿者参加工作的，这是一个很新颖的野外工作组织形式。他们在野外工作中进行了多学科协作，考古学、古人类学、地质学、环境学和年代学工作者在田野和实验室同步取样和研讨。通过这一多学科的综合思维，他们已经对古人类在该地区生存的年代框架、地质条件和环境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水洞沟这次发掘也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难得的实验平台。上述新思路、新理念的实践，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与国际接轨的田野操作规范的建立，中央和地方多个单位、多种学科的协同工作，加上由近20位朝气蓬勃的、以中青年专业人员为主的、多由志愿者组成的发掘队伍，都标志着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拥有新的研究内容、新的工作水平和攀上更高的层次的新时代，亦即一个将在新的世纪得到长足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更高的层次和发展的新阶段似应有一个象征性的名字，我冒昧地称之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艺复兴”。水洞沟遗址和在此开展的科学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呢？我想有三点可以说明。

1. 它处于东西方旧石器时代文化、文明重要的枢纽点上。

在旧石器时代（也许更早），水洞沟地区是不是横亘中亚的东西方交流线路中的一站？已知古生物和古人类的迹象（如三趾马动物的分布）表明，自太平洋西岸的东亚至大西洋东岸的西欧数千公里的欧亚大陆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存在的。但是他（它）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经过哪里且如何能长久地使用，以达到形成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生态意义的东西方交通之路？我们很幸运地发现水洞沟的黄土和由东方的亚洲东部经中亚、东欧一直到西欧的黄土分布带。也许可能由于黄土的分布、沉积、地貌和生态学以及年代学等等，特别是“亲人类性”这一特征，将对说明古人类及其文化的东西交流，从西到东或从东到西等问题上给我们以新的启发。希望今后能有人更多地注意“黄土之路”，也就是将所谓的“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如同高星博士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同志们所强调的新思路、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新领导、新管理的精神一样，进一步发扬和光大，像当年欧洲 15 ~ 16 世纪新的科学技术、体制得到茁壮成长一样，把八十年前德日进、桑志华的首创进行一个“文艺复兴”。

2. 它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史和发展的见证。

八十年前德日进、桑志华来到这里，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裴文中、贾兰坡分别来到这里，以后又来了张森水、李炎贤、黄慰文、周昆叔、黄万波和地质学家孙建中、袁宝印等，以及一大批 1980 年和 2003 年发掘队成员，他们一代又一代人为探求古代人类文明的火种，一次又一次留下了科学思想、理念的沉淀，这将成为由水洞沟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宝贵的文化历史财富。这一系列的、经几代人研究的历史积淀，为发扬并促进今天的文化建设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就像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和人民宽阔开放的情怀、关心古代文化并以此促进现代经济文化建设等以人为本的思想，也正是当初“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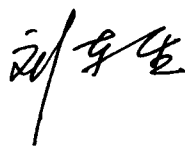
3. 它是展开科学理论探讨的一个起源地。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水洞沟》一书中说：“从目前已发现的我国旧石器文化中，难以找出一个遗址可以与水洞沟文化进行全面对比，从而也难以将其归入我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任何一个系统中。”又说：“当我们视线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时，我们就不难发现水洞沟文化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技术传统有许多相似之处。”最后又说：“为此，进一步加强工作和深入

研究这一广大地域旧石器文化的进展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不仅同意要对水洞沟文化进一步加强工作和深入研究的意见，而且觉得我们在加强工作、深入研究的同时，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展开理论的探讨，目前正是大好时机。

仅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水洞沟遗址非常重要，非常珍贵；我们召开“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意义重大，影响将很长远。众所周知，水洞沟遗址的管理和保护不尽人意，珍贵的科学资源在遭受着侵袭。我们呼吁加强对该遗址的保护，尽量减少或消除破坏隐患，争取在条件成熟时作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使其成为后世人们景仰的古文化窗口。在一百年、二百年乃至五百年后，当人们纪念水洞沟遗址时，希望我们的遗址仍能健在，我们的情感还能有所依托，科学研究的基地还在运转，还能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创新。

祝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在 21 世纪有更大的发展！



二〇〇四年八月于北京

目 录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文艺复兴”(代序)	刘东生(1)
关于旧石器考古研究方法的发展	王幼平(1)
中国北方晚第四纪史前文化与地层划分框架	
..... 袁宝印 侯亚梅 M. Budja 杨小平 黄慰文(8)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特征及相关问题	杜水生(17)
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晚期文化	
..... 黄慰文 侯亚梅 袁宝印 M. Budja 鲁娜(24)	
华北地区石叶工业的分布及文化交流	安家瑗(39)
水洞沟遗址第四纪地层与环境变迁	
..... 袁宝印 尤玉柱 高星 钟侃 王惠民 姚政权(50)	
水洞沟遗址是华北三万年以来的标准剖面	周昆叔(57)
水洞沟文化中的欧洲旧石器技术风格	钟侃 王惠民(59)
水洞沟与莫斯特	汤惠生(69)
水洞沟遗址在旧石器文化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陈伟(78)
水洞沟遗址 2003 年发掘的主要成果	
..... 高星 王惠民 裴树文 陈福友 冯兴无(84)	
水洞沟遗址发现的人类顶骨化石及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脑演化	
..... 吴秀杰、刘武、王兆贤(87)	

宁夏的旧石器遗址	高星 王惠民 裴树文 钟侃(96)
阿拉善左旗栅栏胡图克的石制品	王波(101)
宁夏鸽子山盆地考古报告	中美联合考察队(106)
泾水上游旧石器文化研究	张宏彦(132)
试论我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及主要特征	傅仁义(146)
黑龙江省嫩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辛健 王波(159)
延边和龙柳洞发现的旧石器	陈全家 赵海龙 霍东峰(171)
三峡地区更新世人类活动的信息	裴树文 高星 冯兴无 陈福友 卫奇(180)
三峡兴隆洞出土 12 ~ 15 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和象牙刻划	高星 黄万波 徐自强 马志帮 John W. Olsen (202)
奉节三沱石器遗址	冯兴无 陈福友 裴树文 高星 雷霆军(214)
三峡枝枝膀旧石器与 Clark 技术模式假说(提要)	汤惠生(221)
郧县人遗址石器类型研究	冯小波(223)
溧水神仙洞人类化石和时代再研究	房迎三 何嘉宁 张新锋 周晓丹 沈冠军(234)
安徽芜湖金盆洞旧石器遗址初步研究	郑龙亭(241)
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砾石工业文化用料与环境的关系	韩立刚(251)
对广东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探讨	邱立诚(264)
台湾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文化新发现	何传坤(275)
第四纪末次冰期的古生物学证据	何传坤 祁国琴(287)
丁村的凹缺刃器和锯齿刃器	王益人(293)
细石器石钻工具的实验考古学研究	王波 辛健(302)
旧石器考古遗址中动物骨骼的屠宰痕迹与其解剖位置的关系	胡松梅(311)

黄河上游的皮筏子是从哪里来的	陈星灿(325)
固原开城元代和闽宁村西夏未成年头骨的测量观察	韩康信(337)
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惠民(346)
后 记	(351)

关于旧石器考古研究方法的发展

王幼平

追索我们远古祖先的过去，通过留在更新世地层中的遗物、遗迹来复原史前人类的历史，是一件十分复杂而艰难的工作。要完成此项工作，首先需要有系统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开始以来，方法论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长达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旧石器考古论文与专著不断面世，其中包括很多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进行探讨的力作。总体而言，有着80多年历史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变化相关，旧石器考古所应用的方法也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当前，对旧石器考古方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总结与探讨，是推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继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 文化历史的构建及其研究方法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的构建一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在学科开始之际，通过田野考古发掘方法来发现远古人类文化遗存资料，以类型学方法对资料进行分类描述与比较，揭示出不同时代与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特点，建立起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这是考古学不同分支学科发展初期所共有的阶段性特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也正是如此，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这一阶段最基本的方法。

回顾中国旧石器考古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末，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确都还很有限。发掘工作仅局限于华北、西北地区，只有萨拉乌苏、水洞沟与周口店等几个地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周口店的工作^①。周口店的工作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与研究方法的确立尤为重要。在周口店发掘中开创的“水平方格法”^②，到20世纪80年代的旧石器考古发掘还在继续沿用。多条腿走路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则一直影响到今天^③。

王幼平：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初期,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开始从周口店向华北地区, 进而向全国发展。本阶段仍然延续前一阶段的方法, 但丁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则开始注意旧石器研究方法的规范。50 年代丁村的工作, 在当时是周口店遗址以外最大规模的发掘与研究。丁村石器工业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 丰富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内容。1958 年发表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则是进入 50 年代后所发表的第一本资料详尽、研究深入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④。它在石器描述、分类等方面所确定的规范, 对于其后的中国旧石器的研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在 60 ~ 70 年代期间,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经历了从华北向全国发展的过程。专业人员增加, 田野发掘与研究深入发展, 不断向全国各地推进。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在这一阶段发展的最主要收获是全国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不断完善。贾兰坡先生等在 1972 年提出, 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 即“匭河—丁村系”与“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⑤。两大系统说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从单个遗址与简单的器物描述分类提高到区域性文化与技术传统的综合研究层次^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两大系统说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发展史上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积累,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得以确立,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所独具的特点也逐渐得以揭示。大量利用片状毛坯, 以单面加工为主的石器加工技术, 使得中国旧石器早期文化区明显有别于西方的阿舍利传统。以不规则形石片为毛坯加工石器的传统并不仅仅存在于旧石器时代早期, 到中、晚期也依然是这种情况, 与同期的西方旧石器文化呈现鲜明的反差^⑦。在上述认识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时空特点的过程中, 地层学与类型学方法一直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

进入 80 年代以后, 随着田野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 综合与专题研究的相继展开成为本阶段的显著特点。如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 参加工作的有古人类、旧石器、古生物、地层、冰川、岩溶、古土壤、孢粉、沉积环境及年代测定等学科领域的众多学者, 对于北京人生存时代、生活环境、体质特征与狩猎行为及对洞穴的使用等多方面问题进行探讨, 出版的《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一书集中反映了多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综合研究的新成果^⑧。

本阶段的专题研究更侧重于石器工业。《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开始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对北京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进行分层研究, 概括其石器工业的特点, 并进而对文化发展趋势及其在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讨论^⑨。《观音洞——贵州黔西县旧石器时代初期遗址》也以石器工业为中心, 详细讨论了观音洞文化的特点、时代、分期及其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综合与专题研究的展开说明本阶段旧石器考古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以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资料的报道为中心的情况, 将研究的内容扩大到旧石器的技术与类型、区域性的文化传统等多方面^⑩。

自觉进行旧石器考古方法论的探讨是学科开始步入比较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80 年代所开始的这方面的努力, 实际上也是学科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石器研究中定量分析方法的提倡, 力求建立严格、详细的分类标准, 开始关注动态类型学的研究等等, 都是非常

重要的变化。石器微痕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付诸研究实践。这些努力与实践对于提高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⑩。

二 早期人类发展史的全面复原与方法论的改善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更为迅速。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与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远古人类与文化历史的认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飞速发展，明显与近十多年来方法论的更新同步。方法论的更新与学科的自身发展规律有关，但其结果却是进一步推动了学科本身的发展。回顾近年来中国远古人类与文化研究进展的主要方面，差不多都与研究方法的改进密切相关。方法论的更新，正在为认识中国早期人类及其文化的发展历史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方法论更新的最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本阶段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重点已经开始发生转移。从初创阶段开始，认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时代与空间特点，一直是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重点。随着编年框架的确立，中国远古文化的复杂面貌与多元化发展道路的揭示，寻求对中国远古人类发展史的全面复原已经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所面临的新课题。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的重点不再仅仅局限于了解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而更重要的则是要认识早期人类的行为特点与活动方式，进而全面复原古人类社会发展史^⑪。

由于旧石器考古研究所关注的重点的转移，近十年来，对南方一些露天遗址的发掘，开始有计划地采用大规模平面揭露的方法。这些发掘的学术目的明确，如湖北荆州鸡公山等遗址的发掘，就定位于认识遗址的平面布局，通过对栖居形态的研究，进而复原当时的人类活动与社会发展。在泥河湾盆地东缘展开的一系列早更新世遗址的发掘，在了解不同遗址或地点的时空关系的同时，更注重通过细致规范的科学发掘，引入埋藏学研究、石制品拼合研究等手段，详细审视早期人类的行为特点。近年来在泥河湾盆地中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群的发掘中，也以平面发掘为主，着重了解营地的平面布局 and 不同遗址间的关系，进而了解当时人类的活动。这些工作不但进一步补充完善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更为我们认识远古人类行为特点及其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资料^⑫。

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方法的变化，也与工作重点的转移密切相关。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工作仍然沿用 30 年代周口店发掘所创建的“水平方格法”。这种发掘方法为确立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编年框架曾做出重要贡献，但随着研究重点的转移，水平方格法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探索使用新的发掘与研究方法很自然地成为本阶段的重要任务。

90 年代在泥河湾盆地的发掘与研究，也在进行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

方法更新的尝试。首先是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规范化,开始采用目前国际同行常用的发掘记录方法。在近年来发表的旧石器报告中,研究者都很注意总结、介绍发掘方法的改进实践与收获。新的发掘方法注意发掘探方布局的规划,以保证同一遗址发掘工作的连续性与系统性。从发掘操作到遗物编号、测量、记录、收取保管,都有相应的统一规程,严格保证发掘工作的科学性。这种新的发掘方法,在泥河湾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各项收获都与发掘方法的改进实践密切相关^④。1998年夏天对小长梁遗址的再发掘,更为注重方法论与研究设计。对本次发掘区及以往发掘探方进行系统定位,解决发掘布方工作的无序状态,并且充分利用数码技术与计算机分析方法,采集所有微小化石与石制品碎屑,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⑤。

在泥河湾盆地发掘方法改进的同时,埋藏学的研究思想也引入发掘与研究过程。在发掘过程中,注意地层的细微变化,观察文化与自然遗物的分布与产状及其风化与磨蚀程度、人工与动物啃咬或其他自然因素所留下的痕迹等等。通过埋藏学研究,增进对泥河湾盆地早期诸地点性质的进一步认识。埋藏学与拼合研究等方法相结合,在岑家湾与飞梁等遗址的研究中,对早期人类行为与活动方式的认识取得了新收获。

工作重点的转移,使得改进以石器分类描述为中心的传统方法更为迫切。在继续进行石器制作、使用实验与微痕分析的基础上,石器拼合研究也重新受到重视。泥河湾盆地的岑家湾遗址的拼合研究已经成为这方面的范例。通过拼合研究,可以复原石器的制作过程,还可以进一步认识遗址的埋藏条件,并获得当时人类在遗址内活动的多方面信息。

在本阶段,多学科合作与跨学科研究方法也有进一步发展。近十多年来,旧石器考古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石器文化本身,与人类文化发展相关的诸多因素都成为关注的对象。这些因素的研究必须得到多学科与跨学科方法的支持与配合。正因为如此,本阶段很多项目从计划到实施,都充分注意与相关学科的合作。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但促进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进步,也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条件。90年代以来,皖南宣州陈山剖面的综合研究就是很好的实践。陈山遗址的研究结果,既为华南砾石石器工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古环境背景与年代学框架,也为中国南方第四纪研究建立了标准剖面,因而受到相关学科的重视^⑥。

三 研究方法的继续完善与规范化问题

如上所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旧石器考古走过了从初创到发展等不同历史阶段,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得以确立并不断完善。进入90年代以后,田野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成果仍然层出不穷,成为学科继续发展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从发掘实践到研究内容,以及理论与方法论也都在不断发展。研究重点的转移与研究方法的改善,直接推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对于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在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中也有很长久的历史。早在20世纪

30年代,裴文中先生就曾专门探讨区别天然与人工制品的方法。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基本方法的讨论与介绍的著述自50年代起也不断面世,如贾兰坡先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张森水先生的《中国旧石器文化》等专著及很多专门的论文。近些年来有关方法论研究的著述更明显增多,主要刊于《人类学学报》及其他考古学期刊。在一些与旧石器考古相关的学术会议、论文集中,也经常有相关的讨论。这些研究已进一步涉及发掘方法、石器类型学、微痕分析、拼合研究及埋藏学研究等诸多领域^⑩。

比较前述两个发展阶段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发展特点,可以明显看出,与前六十多年相比,近十多年来旧石器研究方法的变化特别急剧与明显。从发掘到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等不同环节,都有新的方法出现与应用^⑪。一个学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对如此众多方法论方面的变化,很难不出现应接不暇的情况,近年来在田野发掘与研究工作中均有所表现。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旧石器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尚无统一的规范;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如微痕分析、拼合研究,既没有得到普遍应用,也缺乏统一的操作规范;石制品的分类与描述等方面问题更为突出,如一些石制品描述的定位与术语不统一,甚至对人工与非人工品的确认也经常出现因人而异的情况等等。这些情况的存在,显然都不利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科的健康发展,亟待改进并加强规范。

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前后,世界史前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外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迅速发展,不断更新。然而此时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与国际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走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所采用的发掘与研究方法都与国际同行有所区别,甚至一些名词术语也不尽相同^⑫。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旧石器考古学者间的交流得以恢复之后才逐渐受到重视,但也仍需继续改善。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才促使近些年来有关方法讨论与介绍的著述大量增加。很多学者特别关注中国旧石器考古方法论问题,就此发表了很多论著进行专门讨论,力图改进与完善旧石器考古的研究方法。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进,国际同行所应用的一些研究方法与技术也逐渐介绍到国内。为了方便交流,便于中、西方比较研究,一些学者在介绍基本概念与规范术语方面努力工作,发表许多论文或综述文章。面对目前旧石器考古研究方法复杂纷繁的现状,也有学者特别呼吁应该加强基础研究^⑬,建立旧石器研究的规范^⑭。

总结八十多年来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方法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转型期出现的多方面的变化,使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并规范化,对于推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继续发展具有更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目前就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重点转型时期方法论问题展开的讨论,尤其应该注意以下诸方面:

就石器的发现而言,目前已不再仅仅依靠简单的调查或发掘来采集典型的石器标本,而是需要针对具体的学术课题,经过系统规划,确定调查与发掘的对象与方法,进行系统与全面的工作。发掘与调查对象的选定,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特点与课题的需要。应根据发掘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发掘方案。对于保存完好的古人

类遗址宜采用大面积揭露，全面展示遗物遗迹的分布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所有的人工制品以及人类活动有关的标本均应采集，并详细记录出土状况与三维坐标。对于发掘资料，最大限度地保存远古人类活动的各类信息，不仅是为具体的课题研究，而且要作为文物历史档案能够长期保存，这应该是当前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所追求的目标。

传统的石器研究主要集中于石器产品，特别是经过加工、具有一定特征的精制品。目前的石器研究重点已经明显发生变化，精制品等具有标准化意义的石制品不再是人们关注的唯一重点，石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副产品，包括石核、石片、断块与碎屑等也已成为研究对象。对石器生产的研究，也更注重对石器生产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将石器的生产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或操作链，包括从原料选择、坯材整形、剥取石片、修理加工直至使用与最后废弃等不同阶段的一系列活动。

类型学研究是旧石器考古学的基础，旧石器类型学研究的进步推动着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科本身的发展。近年来加强基础研究与规范化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对旧石器类型学研究继续完善的要求。虽然中国旧石器类型学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已经走向成熟，但学科本身的发展并没有停止，而已经开始跨入探索早期人类行为与活动特点、全面复原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与此相应，旧石器类型学研究也还要继续发展。其发展自然包括加强基础研究与规范化的问题，但同时，动态类型学与操作链的研究模式的提倡，也应该受到充分重视。

随着旧石器考古学的深入发展，实验与微痕研究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也越来越大。实验与微痕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是传统石器类型学方法无法获得的。这些信息对于我们认识远古人类的活动方式与行为特点，复原史前社会历史至关重要。我国学者虽然也很关注微痕研究方法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但已经开展的工作还比较有限。在已有的工作中，也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显微镜类型、放大的倍率的使用，微痕观察的重点与方法等。关注这些问题，加强交流尤为重要。

石器原料是史前人类制作工具，从事生产活动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仅注重对所用过的原料做出岩性鉴定，以及统计出不同岩性原料使用的比例，并不能充分利用石器原料所蕴含的有关史前人类活动的大量信息。石料研究应该更注重探讨石器原料的开发利用、石料对史前经济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等。石器原料的多寡与质量的好坏，都会直接影响到石器加工技术的发挥，并进而影响到石器工业的整体面貌。根据石器原料的选择、开发与利用情况，还可以观察到史前人类认知能力、生产力的发展等等，并进一步得到当时人类的活动范围，甚至贸易交换及社会网络等多方面的信息。

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最基本的生产与生活用具。远古人类为了维系繁衍生息所进行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石质工具。因此，石器一直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核心。透过对石器的研究，不仅可以建立起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更可以认识石器生产者的活动与行为特点。史前学者研究石器的目的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石器的本身，而是更要通过石器的研究来认识远古人类的活动与行为特点，全面复原史前社会的各方面，并进而认识早期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历程与规律。

总之，从石器的发现开始，到石器的生产、类型学、功能与原料的研究，进而到对史前社会的复原，石器研究的方法可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能够将其有效地联结为一体的正是石器生产的操作链。石器生产操作链，或称是石工具的生命史，也是古人类活动的记录。在长达 200 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生产过大量的权宜的与精制的工具。透过这些粗糙的或精美的石制品，可以追溯到无数条或简或繁的石器生产操作链，而这些操作链所连接的却是更新世的狩猎与采集者们的生活历史与进化历程。因此，我们要特别注重石器生产操作链的作用，并以此为纽带将旧石器研究方法有机联结起来，更有效地完成旧石器时代考古所肩负的任务。

参考文献：

- ①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年。
- ② 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年。
- ③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 年。
- ④ 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 年。
- ⑤ 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 年，(1)：P39～58。
- ⑥ 高星、欧阳志山：《趋同与变异——关于东亚与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比较研究》，见童永生等：《演化的实证》，海洋出版社，1997 年，P63～76。
- ⑦ 邱中郎、李炎贤：《二十六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P43～66。
- ⑧ 吴汝康等：《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 年。
- ⑨ 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 年。
- ⑩ 李炎贤、文本亨：《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 年。
- ⑪ 同注③。
- ⑫ 王幼平：《迈向新千年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文物出版社，2002 年，P52～61。
- ⑬ 同注③。
- ⑭ 卫奇：《泥河湾盆地半山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初探》，《人类学学报》，1994 年，13（3）：P223～238。
- ⑮ 陈淳等：《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 1998 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9 年，18（3）：P225～239。
- ⑯ 赵其国、杨浩：《中国南方红土与第四纪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5 年，(2)。
- ⑰ 同注③。
- ⑱ 高星：《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八十年的辉煌与思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2 年，(13)：P14～22。
- ⑲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回顾与展望》，《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 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 年，P1～26。
- ⑳ 张森水：《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人类学学报》，1998 年，17（2）：P81～93。
- ㉑ 卫奇：《石制品观察格式探讨》，《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1 年，P209～218。